

世界文明系列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世纪国宝I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国宝 II /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4
ISBN 7-108-02267-2

I. 世... II. ①中... ②中... ③中... III. 文物—中国—图录 IV. 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825 号

世纪国宝II

主 编: 罗伯健 董 琦 王建琪

副 主 编: 杨 阳 王昱东

执行主编: 潘守永

学术顾问: 徐苹方 杨 泓

撰 稿: 徐苹方 杨 泓 松本伸之 潘守永

责任编辑: 张 荷

特约编辑: 王 联 [阳光谷]

装帧设计: 朱 鐸 [阳光谷]

设计制作: 彭少江 [阳光谷]

翻 译: 盛 洁 代红光 徐 冲

摄 影: 朱洪宇 马建培 牛犇东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印 数: 0,001 - 2,5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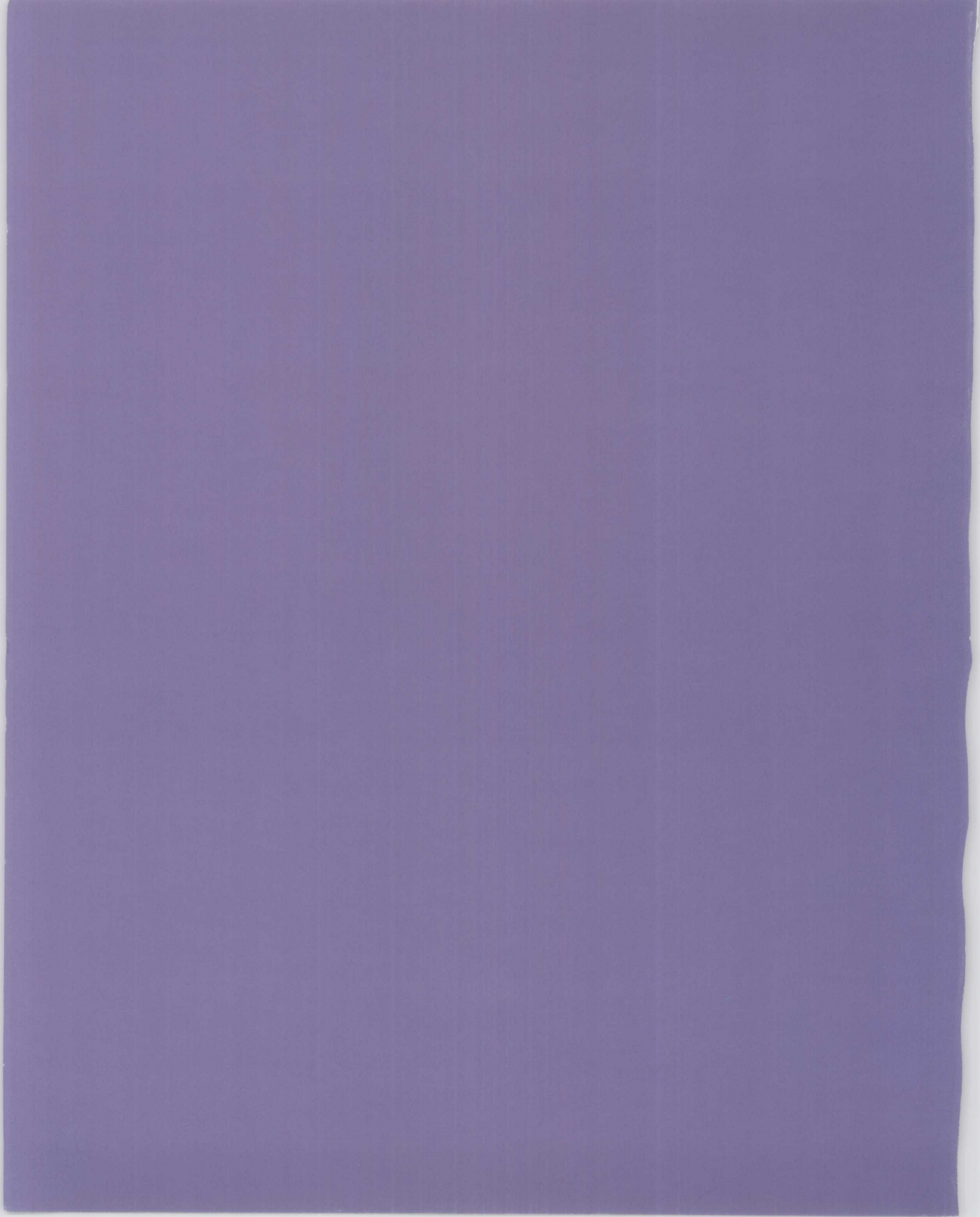
定 价: 290.00 元

世界文明系列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世纪国宝II



祝 辞

单霁翔 国家文物局 局长

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共同承办的《世纪国宝展Ⅱ》，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隆重开幕了！这是继2001年，我们在这里成功举办《世纪国宝展》之后的又一次文物大展。

展览由二百多件展品组成，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家文博单位，展览规模大，文物等级高。2004年9月至2005年3月，展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大阪国立国际美术馆展出期间，有四十多万观众前往参观，获得很大成功。

展览中的相当一部分展品是佛教文物，它们系统地反映了东汉至宋代佛教艺术的发展变化。展品主要来自青州龙兴寺遗址、荥阳大海寺遗址、成都万佛寺遗址、西安安国寺遗址、山西应县木塔、镇江甘露寺塔基、杭州雷峰塔塔基等著名的佛教遗址。如此众多的佛教艺术精品的集中展示，是极为难得的。

展览中还有一部分展品是近年重要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物。像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玉器，安阳殷墟商代青铜器，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荆州战国漆木器，秦始皇陵园陶文吏俑、杂技俑、彩绘铜鹤、石甲冑，徐州西汉楚王陵金缕玉衣等等，都曾闻名海内外，也是展览中脍炙人口的亮点。

鉴于组织这样大型的文物外展实属不易，又考虑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们再次举办了这次文物外展的“回国汇报展”。今后如有可能，我们仍将坚持这样做，把更多的文物精品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预祝展览获得成功！

2005年4月

致 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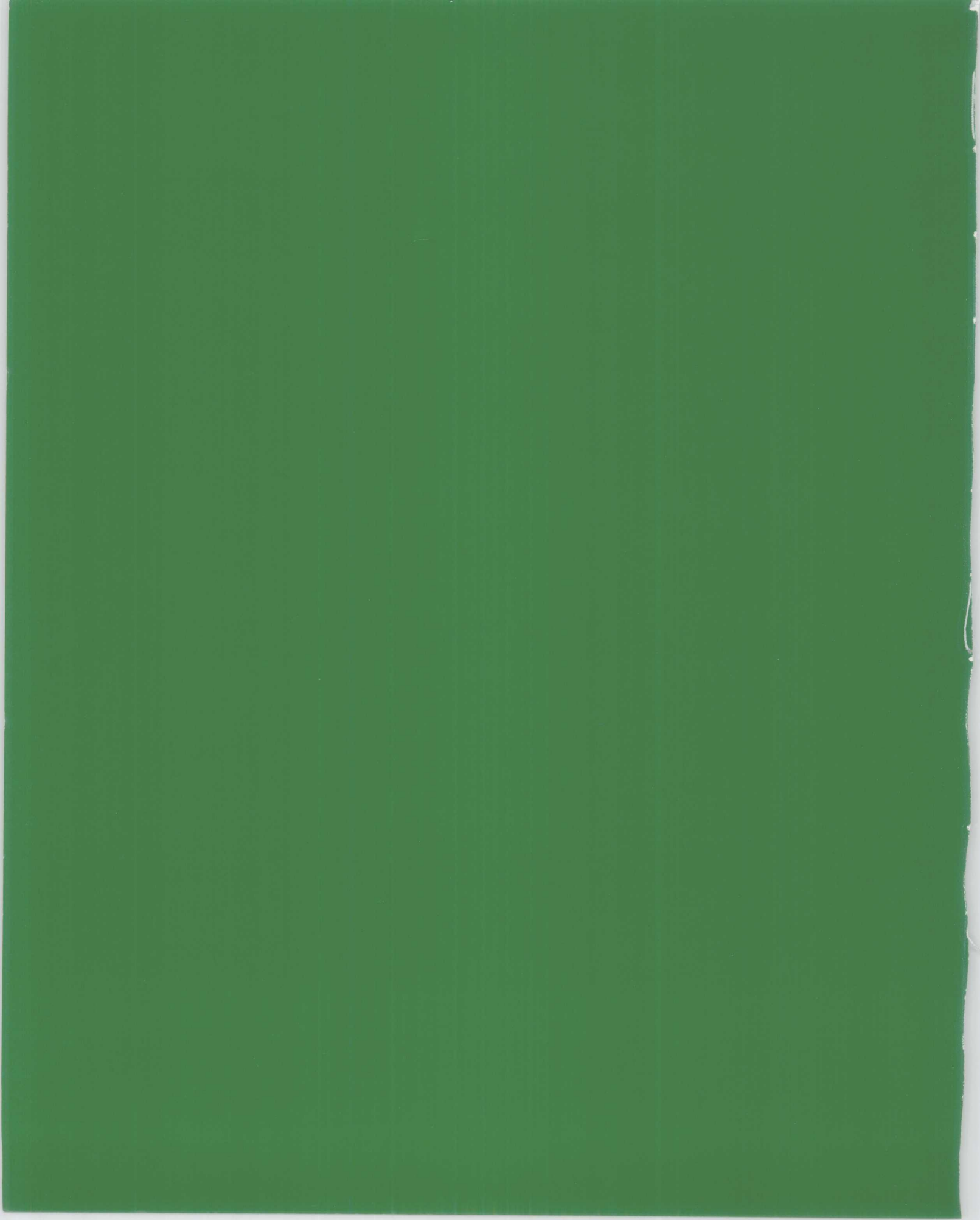
张 茅 北京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纪国宝展Ⅱ》即将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令人不禁联想起五年前，当新世纪的曙光第一次照耀在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上空时，《世纪国宝展》作为特别的世纪礼物，在新落成的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呈现给了热爱中华传统文明的众多观众。展览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成为北京新世纪文化活动在一个全新高度上的起点，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今天，随着北京建设与发展速度的加快，一个全新的东方国际大都市，与其所承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明正在向世人展现出无穷的魅力。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全社会都在为实现人文奥运的目标而努力。此次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再度联手主办展品精美、情趣高雅、规模空前的《世纪国宝展Ⅱ》，是传扬中华文化、营造奥运文化氛围的一大美举。在此，谨向国家文物局和承办及参与此次展览的所有机构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预祝《世纪国宝展Ⅱ》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圆满成功！

2005年4月13日



刚刚进入21世纪,《中国国宝展II》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之后,回到国内与广大观众见面,这是继2000年第一届国宝展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展出。四年前,我曾以《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在《世纪国宝》一书中,把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及其学术成果,作了概括的叙述。今,再为此展览介绍进入21世纪初(2000~2003年)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这四年之间,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势头不减,每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都在五百项左右,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层出不穷。我在这篇短文中,只能介绍这四年间最重要的中国考古新发现,或许有助于来参观这个展览的观众对中国考古学新成果的认识。

「一」

21世纪初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有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浙江吉安上马坎遗址、北京周口店田园遗址和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群。最重要的是两项:

1.北京周口店田园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西面六公里处。2001年6月发现,出土的人类化石属于智人,与山顶洞人比较接近。发现了二十六种哺乳动物化石,以斑鹿为主,与山顶洞人伴出的动物化石基本一致,也有是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动物化石,如猪獾和苏门羚。未发现石器。根据鹿牙用铀系法所测年代约距今2.5万年。

2.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80年,2000~2003年在第9、12、14三个地点发掘了一百多平方米,发现用火遗迹十余处,有的灰烬尚在。共出土石器、装饰品、动物化石一万多件,其中有石磨盘、石磨棒以及赭色颜料块和“石砚”(研磨器)。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约距今两万到一万年以上,正处于中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阶段,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课题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有: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陕西佳县龙山文化遗址、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江阴祁头山遗址、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余杭卞家山遗址、铜乡新地里遗址、萧山跨湖桥遗址、青海民和喇家村遗址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21世纪初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主要是指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研究;二是新石器文化向夏、商、周三代文化过渡的研究,实际上是指中国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也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三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本身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个课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课题。

21世纪初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在开展田野考古时,大体上是从这三个学术课题来考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已在上节所述的柿子滩旧石器文化遗址内发

现,属于从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阶段。本节要介绍的多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的遗址,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反映着不同文化类型本身的演变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纠葛,这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演进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最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多集中在中国南方的江浙地区,在上面所列举的十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六个在江浙地区。年代最早的是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7000年之间,文化的面貌显示出是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重要的是,出土的稻谷与稻米已显示出栽培稻的特征,与现代籼稻相似,但硅体形状却与粳稻接近;同时还存在粒形和野生稻相似的稻谷。这些现象说明跨湖桥遗址的稻谷,可能是培植野生稻时但尚未完全成功的原始栽培稻。另外,在遗址的第9层下发现了一只独木舟,所属的年代约距今8000~7500年之间,这可能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江阴祁头山是马家浜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颇具特色,尤以高筒形带釜陶釜最为典型。海盐仙坛庙遗址发现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和祭祀坑,出土遗物735件(组)。余杭卞家山在良渚遗址群南侧,发现了良渚文化墓葬和居住遗址,还有由竖立的木柱构成的湖滨遗址。桐乡新地里遗址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高台墓地,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出现明显的贫富差别,显贵者的墓葬多在墓地北面,已有棺槨两重葬具,随葬多种精美玉器;平民墓葬多在墓地南面,一般没有葬具,只随葬石器而无玉器。这些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古文化,包括萧山跨湖桥文化类型、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之间的传承演变,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的地位等,都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两座龙山文化古城遗址,引人注目。第一座在中国西北部陕西佳县石寨山,是一处龙山文化山城。内城建于山顶最高处,外城环绕于山体中下部,依山势用石块累砌。发现房址十八处,窖穴八十多个。从出土陶器来看,应属龙山文化中晚期。第二座在中国东部沿海江苏连云港藤花落,有内外两重城,其间有城门道路相通。内城有两处夯土台基,发现三十多座圆形、长方形单间双间房、排房和“回”字形房址。“回”字形房址在2号夯土台基上,外间面积一百平方米,内间面积三十平方米,与一般居室不同。还发现了稻田遗迹,从炭化的稻米观察,已与现代栽培稻接近。藤花落古城遗址在龙山文化晚期衰落,其后则被岳石文化所代替,岳石文化的居民继承了龙山文化藤花落古城的布局,这种现象在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史上很有价值。

另外,两个重要发现是青海民和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前者主要是呈现出这个遗址遭受地震灾害时被掩埋的瞬间景象,特别是那一副母亲紧紧搂抱婴儿的尸骨遗迹,动人心弦,这是考古发掘中十分难得的镜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的发掘,发现红山文化墓葬十三座,其中M4为保存最完整的大墓,出土精美玉器八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后来被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所占据,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址、窖穴和灰坑破坏并叠压着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以陶器和石器为主的,与红山文化墓葬中的精美玉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考古地层上明确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肯定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年代。

三

夏商周时代考古新发现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安阳洹北商代遗址、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安阳殷墟花园庄54号墓、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商代甲骨、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单氏铜器窖藏、河南洛阳东周大墓和车马坑、河南新郑郑韩故城东周大墓和车马坑、河南信阳长台关7号楚墓、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古蜀国船棺墓葬群、贵州可乐战国西汉墓群和新疆尼勒县穷科克墓群。最重要的有三项:

1. 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单氏铜器窖藏。2003年1月发现。在一个竖井横穴内出土西周青铜器二十七件,鼎十二件、鬲九件、方壶二件、盘盂各一件,除铜盂外,器形皆是西周晚期的式样,花纹以环带、垂环、窃曲纹和各种龙纹装饰为主。更重要的是铜器铭文,二十七件都有铭文,述盘铭文最长,多达372字,记述了单氏家族从皇高祖单公到速八代历史,并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

鼎的铭文中记述了单氏家族辅佐文王、武王兴周灭纣，北伐戎狄、獫狁，南征楚荆，管理虞林因功受封赐的事迹。在单氏铜器铭文的记述中，基本上可以把单氏八代和周室十一代十二王的世系对应起来，证实《史记》所载西周诸王的世系是正确的，也证实西周积年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最为接近。这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西周考古发现，它对研究西周铜器和铭文，特别是研究西周纪年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2.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2001年2月发现，在成都市西郊金沙村，范围陆续扩大，已发掘的有金沙村、黄忠村、万博、兰苑和梅苑等地点，总面积已超过4平方公里以上。遗址内涵十分丰富，有居住遗址、祭祀遗迹和墓葬。居住遗址面积很大，其中有不少是大型居址，长度在25米以上，竹木骨泥墙尚存，最大的居址长54.8米、宽8米。在梅苑发现有象牙堆积坑，伴出玉器和铜器；有半成品的石璧、石璋等堆积；还有象牙、鹿角、野猪牙、玉器、陶器和美石雕刻品的堆积。发掘者认为这些遗迹与祭祀有关。墓葬比较简单，有些是在金沙遗址废弃后埋入的。金沙遗址共出土金、玉、铜、石、陶和象牙骨器等数千件，金器多为装饰品和金箔，铜器多小型器物，铜人和牛首等也属小型饰件；金沙金铜器的造型纹饰都与广汉三星堆相似。玉器以琮、璧、璋、圭、钺等礼器为主，制作精细，形制皆源于中原，而也与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玉器有密切关系，金沙玉琮的形制风格几乎与良渚一致。玉器中有些人物的造型在衣冠服饰上皆与三星堆相似。陶器中的小平底罐、高柄豆皆源于三星堆；尖底盏杯则与成都十二桥文化相同。金沙遗址是继成都十二桥文化和广汉三星堆文化之后，在四川成都平原上新发现的相当于中原商末西周前期(约在公元前11世纪~前10世纪)古蜀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3. 四川成都商业街古蜀国船棺葬。2000年7月发现。是一座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坑长方形(30×21米)，因汉代以前已遭破坏，墓坑现存船棺、独木棺十七具，估计原来应有三十具以上。棺具皆用整根楠木剝削而成，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4米。在墓坑底部有排列整齐的垫木十五排，墓坑北部为大型棺具置放处。棺内残存随葬品有漆器、陶器和铜器等，尤以漆器最为精美，其中有漆几案和悬挂钟磬的漆架残件，把汉代以来广汉制漆的手工业的历史提前了三四百年。成都古蜀国船棺葬应是我国战国时期蜀国开明王家族的墓地。它的发现在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至于襄汾陶寺城垣、安阳洹北的商代宫殿遗址也很重要，田野工作尚未结束，有些遗址尚有待于继续认证。

四

近年，秦汉考古最重要的发现，首推湖南湘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秦代简牍，2002年4月发掘。古城遗址东部已被酉水冲毁，南北长210米，东西残宽107米，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房屋基址和作坊遗址等，此城初建于战国中晚期，现存城址的年代为西汉。特别重要的是在城内1号井中发现了36000枚秦代简牍，是在秦亡时遗弃在井的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文书档案，始自秦始皇二十五年，止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22年~公元前208年)，内容涉及政令、各级政府间的来往文书、吏员名籍、田亩租税、法律爱书、仓廩军备、邮驿里程，以及私人信件等，是前所未有的秦代基层政府的原始档案。秦汉之际，正是中国社会从商周以来的血缘政治结构，向秦汉以后以郡县制为主的地缘政治结构转化的过程，里耶秦代简牍的发现，将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的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政治结构的变化提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另外，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随葬的各种青铜禽类，丰富了秦始皇陵园陪葬坑的内容；山东日照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的汉代漆器，证实了文献上所记汉代齐鲁盛产漆器的史实；北京发现的老山汉墓，虽然早年已被盗掘，但其“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以及残存的彩绘陶器和棺盖上覆盖的西汉织锦缎，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珍贵遗物；继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及其官署遗址发现后，最近又在广州市区发现了西汉南越王时期的水闸遗址，从其工程作法上来看，已达到了当时很高的工程技术水平。

魏晋南北朝考古，在城市考古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宋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在钟山南麓山坡上发现的南北在一条轴线上的两座石砌祭坛，南面的1号坛方64米，四层，坛顶上有四个方形

土台，北面的2号坛方22米，也是四层，坛顶被后代挖坑而破坏。出土六朝砖瓦、莲花瓦当、莲花石座和青瓷残片等。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南朝刘宋所建之北郊祭坛。在南京市左行官发掘了六朝建康城内的东西、南北交叉的大路、排水沟、木质桥梁、房屋基址、砖砌水井，以及可能是古城城墙的残段。这是首次在南京市发现的孙吴、晋和南朝叠压着的建康城遗迹，证实古建康城是被埋藏在元集庆路坡的范围内的地下，这对探索六朝建康城址有重要价值。北魏平城遗址也一直是个不解的谜，前几年在大同南郊发现了北魏平城南郊明堂遗址，最近又在大同旧城以北的操场发现大面积的北魏宫殿遗址，出土多种莲花、人面和“大代万岁”、“永□寿长”、“傅祚无穷”等文字瓦当，北魏宫殿基址下压着汉代遗址，这与《南齐书·魏虏传》太祖拓跋珪“截平城西为官城”的记载相符，说明北魏平城官城应在今大同旧城之北。洛阳汉魏故城阊阖门遗址也作了发掘，证实是一处殿堂式建筑，初建于魏晋，北魏、北周时沿用。在邙南城朱明门外东侧还发掘了一处规模宏大的东魏北齐佛寺塔基。

吉林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和丸都山城也作了发掘，在勘测国内城城垣时，发掘了北城垣近西北角的一座城门，这是一座既不见于文献，也未被考古所发现的城门，门洞两侧尚保存着木质地袱和竖立的排叉柱痕迹，显然是过梁式的木构城门；在城内北部发掘了居住遗址，在丸都山城发掘了南门、西南门和瞭望台，城内发掘了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坐东朝西，依山势筑为三层阶地，各有平面方形、八角形和长方形建筑，出土众多的建筑饰件和瓦当。对高句丽王陵陵园也作了勘察，发掘了陵侧的建筑遗迹。

在魏晋南北朝墓葬发掘中，以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徐显秀墓的壁画家居和出行图保存最好，并出有各类随葬品五百余件；山东临沂两座西晋砖室墓随葬有青瓷器、铜器、正始二年(241年)铭铜弩机、太康十年(289年)铭的漆器和精美的金钗，与江南西晋墓所出完全一致。最令人有兴趣的是西安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安伽墓和史君墓，与以前在太原发现的虞弘墓都是在北朝入仕中国的中亚昭武九姓信奉火祇教的粟特人后裔，在他们墓中的石棺床围扉上或石廓上，都雕刻着已汉化了但保存火祇教拜火仪式，以及粟特人原有的生活习俗的图像，这对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和各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历史提供了生动的形象资料。

隋唐五代的考古，以西安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它把唐昭陵北司马门的形制，以及后代改建变化的情况，以考古发掘所得的材料给予正确的复原。对昭陵北司马门放置昭陵“六骏”和“十四国番君长”石雕像的位置也从考古发掘中作出了判断。五代十国的帝陵已发掘的有四川成都前蜀王建墓和后蜀孟知祥墓、南京南唐二陵、杭州吴越钱氏陵墓，但是，地处岭南的南汉帝陵都仍然是个谜。2003年5月在广州番禺区新造镇小谷园岛大香山发现南汉高祖康陵，康陵地宫全长11米、宽3.15米、高3.3米，四层券顶；前室立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刻石，明确地说明此墓为南汉高祖刘岩墓，他卒于南汉大有十五年(942年)，当年(即光天元年)九月葬于康陵。康陵陵台方座圆丘，开中国古代帝陵陵台为圆丘之先声。在南汉康陵发现之前，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帝陵变方型墓顶为圆顶始自明孝陵，南汉康陵的发现提出了新的例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五代考古轰动的发现是杭州雷峰塔地宫的发掘，雷峰塔是吴越国王钱俶在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建造的，地宫出土的银质鎏金阿育王塔(金涂塔)，镂刻精细，鎏金铜坐佛下有飞舞的龙柱承托，是唐宋佛教金铜造像中的佳作。

在隋唐五代考古中关于瓷窑遗址的考古也不可忽视，河南巩义市唐三彩窑址的发掘是比较重要的。在晚唐的地层中发现了钴蓝青花瓷，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烧制唐三彩的窑炉和作坊，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唐三彩器；著名的洛阳唐三彩的产地便应在巩义市。宋元时代考古发现包括辽、金、西夏和明清在内，主要是城市、陵墓和瓷窑遗址。扬州是中国唐宋时期的名城，以前曾发掘过扬州南门和西门遗址。2000年又发掘了东门遗址，现存遗迹是南宋时期的，是一座有内外两层瓮城的特殊形制。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它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属于古今重叠的典型城市。以前曾在杭州勘察了南宋临安城的皇城，发掘了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2001年又发掘了南宋恭圣仁烈刘皇后的宅第。在黑龙江阿城市金上京遗址东3.6公里处刘秀屯发掘了金代宫殿遗址，它是一组平面“工”字形的大型建筑，前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两侧有东、西朵殿，前有月台，后有抱厦，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前后殿之间有长47米的过廊，这是迄今为止正式发掘的金代

规模最大的宫殿基址。文献上对这座宫殿基址没有任何记载，它应是金上京的一部分，在金海陵王平毁上京宫殿时一并被毁。

北京金陵在北京市西南大房山麓，是金海陵王自上京迁都燕京金中都后建立的金皇陵区。贞元三年(1155年)迁金太祖、太宗和金始祖以来诸帝灵柩入大房山北域，并在此葬海陵王、世宗、章宗诸帝，明末因断后金(满人)“龙脉”而被彻底破坏。2001年全面调查金陵情况，发掘了神道上的石桥、踏道和陵前的大殿、配殿基址，在偶然的情况下发掘了金太祖阿骨打的迁葬墓，竖穴石坑(13米×9.5米)内葬四具石棺槨，龙槨破坏严重，凤槨尚完整，由于是迁葬，随葬品很少，但石槨上的龙凤雕却极精美，可视为金代石雕的代表作。宁夏银川西夏第3号陵园在2000年作了全面发掘，证实西夏陵园的形制基本模仿巩义市北宋皇陵，但内陵垣前加月城，四角建塔式角楼，陵前献殿平面呈八角形，两侧建有巨大碑亭，则是西夏王陵特色。辽代契丹贵族墓以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代早期墓的发掘最为重要，木棺和棺床须弥座上皆髹漆贴金彩绘侍卫和各种花纹图案，华丽之至；墓主套穿十一层丝织衣物，出土的金银饰品、铜器、漆器、玻璃器，以及整套马具，都是罕见的珍品。

宋代以后瓷窑遗址的发掘及其取得的成果，是这个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窑址十五座，作坊、釉料坑和澄泥池各二处，窑址密集，窑炉更新频繁。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北宋铜钱的年代判断，清凉寺汝窑属北宋哲宗、徽宗时期(1086~1117年)三十年间作坊，有些产品极为精美，是北宋汝窑的代表作。河南禹县神皇钧窑遗址发掘了不同时期的窑炉八座、澄泥池三座、作坊五处，出土了大量钧窑瓷器；发掘结果表明，钧窑产品可分三期，北宋晚期至金前期(约11世纪末~12世纪中叶)是钧窑的鼎盛时期，器形多样，陈设器占一定数量，天青色釉淡雅匀净，釉层较薄，有外施红釉的器物，钧窑器形釉色的特征形成于此时；金代后期钧窑产品粗糙，器形变大，器壁变厚，挂釉不满，出现了月白色釉；元代钧窑大型器物增加，壁厚釉厚，釉色变化多样，有紫蓝、褐绿和带红斑的釉色。杭州老虎洞宋元窑址一直被认为可能是南宋修内司窑，从1999年开始发掘，到2001年做了全面的发掘，在南宋层中发掘龙窑一座、作坊房基三座、澄泥池四处、废瓷片堆积四处，出土瓷器以仿古陈设器炉、尊、觚为主，黑胎较薄，以厚重的粉青釉为主，间有米黄色釉，系多次上釉，有开片或冰裂纹，有支烧和垫烧两种制法，这无疑是所谓南宋“官窑”的产品，不论从烧制技术和产品风格中，老虎洞窑都继承了北宋汝窑的传统。在老虎洞元代晚期的产品中有类似传世“哥窑”的瓷器，经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测定，它与传世“哥窑”的化学和物理结构相同，为传世“哥窑”瓷器的身世作了验证，这在中国陶瓷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次突破。景德镇珠山明清官窑遗址的发掘在2002~2003年进行，发掘了明初官窑窑炉四座，埋葬永乐后期至宣统早期官窑落选贡品瓷片遗存二处，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官窑瓷器标本。窑炉在宣德文化层下发现，为平面做葫芦形，由窑门、火膛、前室和后室组成，这种形制的窑炉是首次发现。落选贡品瓷片绝大部分都可复原出完整瓷器，重要的有永乐红釉梅瓶、釉里红龙纹梅瓶、青花釉里红龙纹梅瓶和有“永乐年制”的红釉盏，宣德款的瓷器有白釉、红釉和仿哥窑碗、盘和盏，琳琅满目，有些是从未见过的孤品。

最后，我还要提到的是江西南昌李渡酿酒作坊遗址和北京圆明园含经堂与澹怀堂大型宫殿遗址的发掘，它们也都各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国家文物局主编 2000~200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1~2004年出版

中国佛像的变迁 从东汉到南北朝

松本伸之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事业企画课长

提到中国的佛像，人们脑中首先会浮现出云冈、龙门或者敦煌等石窟寺院的佛像。这些在石窟寺院中大规模建立的佛像，多达数十万座，透露出佛像文化兴盛时代来临的气息。另一方面，在中国各地，与石窟寺院中形象统一的佛教造像不同，也留下许多满足供养人要求、个别制作的单体佛像范例。偶然发现的佛像、弃置在村落中流传下来的佛像以及近年考古调查发掘出的佛像等，形形色色流传至今。这些历经许多朝代、跨越诸多地域的佛教造像遗迹，有时比起在石窟寺院中存留下来的佛像，更加详细地反映了历史上佛教文化的面貌。

这次国宝展览，试图以这些单体造像为中心，从开始制作佛像的东汉时期，按照三国、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北宋等佛教文化兴盛的诸时代这样的顺序，通过各时期、各地区代表性佛像的遗物，追溯中国佛教美术的流变过程。当然，完全再现约一千年的中国佛教美术史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凭借这里展出的佛像，还是能够大概总结出各时代的特色。这篇短文，希望能够以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佛像为着眼点，概述从中国佛像萌芽时期到佛教文化第一个顶点的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变迁，从而对深入理解中国佛像有所帮助。

东汉到西晋的佛像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距今2000年前左右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末年。可以确定的佛教信仰具体事例，则是从东汉以后开始的。《后汉书》中记录着东汉第二代帝王明帝(57~75年在位)的异母弟楚王英及此后一百年的桓帝(146~167年在位)将黄老(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和“浮屠”即佛(Buddha)一同供养的事情(卷42《楚王英传》、卷7《桓帝纪》等)。根据记载，桓帝时候曾置华盖(遮在头上的伞)座和祠堂来供养佛，这个时期，不论在绘画还是雕刻，作为崇拜对象的佛像已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佛与当时中国原有的、祈祷不老长生和现实利益的神仙，作为同一类神受到崇拜，这是中国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从桓帝到下一代的灵帝(168~189年在位)，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西域和印度的僧侣千里迢迢从西方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不久由他们开始佛经的翻译工作。这时译成中文的佛教经典(支娄迦谶译《道光般若经》、《般若三昧经》等)中，记载了制作佛像和供养佛像，不仅仅可以增长功德，而且是觉悟的方法等，有很多意义，这样佛教经典的流传就为佛像制作的盛行打下了基础。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发展到了顶点，全盘吸收西域风俗的情况记载于《后汉书》(《志》卷13等)，这样的社会背景也成为接受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基础。

其后在灵帝年间，开始出现关于佛像的具体记载。笮融在江苏省徐州建造寺院、佛像的记载正是如此。根据《三国志》(卷49《刘繇传》)，笮融建立了可以容纳三千余人的楼阁式“浮屠祠”，即佛教寺院，并在寺中供奉佛像。佛像“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笮融还曾进行过“浴佛”的活动。这是中国正史中可见的最早关于建造寺院、佛像的记载。笮融制造的佛像为铜制，并涂以黄金，即今天所谓的金铜佛，但与普通的金铜佛不同，身上穿着特制的锦衣，是非常珍稀的造像。这一信息暗示着佛像可能表现为裸体或是接近裸体的状况。提到佛像裸体，首先令人想到诞生佛，而且从“浴佛”一事，可以马上联想到在4月8日释迦牟尼诞辰日，用香水、香汤浇注诞生佛来庆祝的灌佛仪式。在《后汉书》等当时的其他记载中，也可看到关于释迦传记的记录，由这些记载和笮融浴佛的事情可知，在东汉末期，释迦的传记即佛传故事，可能对佛教信仰的扩大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与笮融所在的徐州相近的山东省沂南，于画像石墓柱上发现了二重头光的人物立像。不论这一图像是否明确表现的是佛像，受到佛教图像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画像石墓兴建的东汉末期，在笮融所在的徐州到建造这座墓的山东的范围内，佛教正在一步步传播扩展中。

继东汉以来，在魏(220~265年)、吴(222~280年)、蜀(221~263年)三国鼎立时代，根据记载洛阳有三座

寺院(《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汉译佛经也不断增加,佛教慢慢地被接受下来了。同时,在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发现了佛教信仰的事例。吴国的财政基础比较雄厚,以都城建业(南京)为中心文化繁荣,境内似乎也居住着外国僧侣。据说印度系二世僧侣康僧会,经由南方的越南于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佛寺,并供养佛像。通过这些僧侣,佛教也慢慢渗透到长江下游地区。

三国之后,到了短暂的统一王朝西晋(265~316年),据称都城洛阳有42座寺院(《洛阳伽蓝记》),另一说洛阳等两京共有180所寺院,3700名僧侣(《辨正论·十代奉佛篇》)。西晋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开始变得十分活跃,佛教在中国渐渐扎下了根。这一时期关于造佛活动,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北魏(439~534年)时从地下发现刻有西晋太始二年(226年)铭文的佛像,因而备受瞩目。根据记载,佛像为高3尺的金铜制三尊佛,台座上刻有铭文,记录了供养人荀勖的名字。当时的3尺约近80厘米,虽然佛像像容不明,但是在西晋初期就已有根据汉人祈愿塑造的半身大的金铜佛像,是极其重要的记录。

从东汉到三国、西晋为佛教的接受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散见一部分这样的造像记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单体的佛像遗物。不过在摇钱树、魂瓶或青铜镜等器物上表现的佛像遗物还是有所发现,尽管只是片断性的材料,却可以窥见当时佛像的具体形态。这些遗物,在近年的材料中开始一点点发现,值得浓墨书写的是,遗物一般与史书记载的当时信仰状况相符合,表现了佛像与中国自古以来的神灵同列供养的情况。在摇钱树、魂瓶、画像砖及香炉等中表现的,是头上带有肉髻(如来特有的头顶的肉隆起)、身穿袈裟的如来坐像,附有圆形的头光的例子也有很多。推测兴建于东汉末期四川省乐山县的麻浩崖墓,梁上有一对浮雕佛像,像容相同,大概自很早的阶段就开始以这种形象表现佛像。另一方面,青铜镜(鸾凤镜和佛兽镜等)和金饰具等中表现的佛像,不仅仅只有如来坐像,还有立像和半跏像,菩萨或天人像以及下设莲花座的佛像也有发现,采用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图像形态。大约到4世纪初期,各种佛教图像已经流入中国了。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所见到的佛教接受时期的遗物,仅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四川等一部分地区,所谓的佛像,也仅仅是器物的一部分。当时佛教信仰的中心地,即以洛阳为首的中原地区,通过考察竺融、荀勖的事迹,单体的佛像已经造立,原本应当将它们置于造像的主流地位。但是,中原地区作为历代王朝逐鹿的舞台反复遭到战乱的蹂躏,寺院和在寺院中供养的佛像已完全归于灰烬,不能把这些无法进入我们视野的遗迹作为事实去考虑,是一大遗憾。因此,需要铭记的是,我们看到的上述佛教接受期的遗物,始终只是停留在体现地区性造像的一个侧面上。与此相关,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摇钱树上的佛像以及长江下游魂瓶上的佛教图像,到底通过怎样的途径传来,其传播的路线又如何呢?就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难题。目前,关于到达四川的路线,有从西域直接流入、经由洛阳等中原地区传入以及从云南传来、经由南海传入江南地区再沿长江上溯到达四川等等若干假设。现在,可作为证据的资料还很匮乏,这一问题今后是遗留的课题之一。不止如此,摇钱树和魂瓶上的佛像,根据制作时期和地域的限定、类型学的特征,可推测在制作背景中是否曾存在过某些特殊的情况,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也是有待今后继续研究的地方。关于摇钱树和魂瓶上的佛像,已经有许多论文详细阐述过,可资参考。

五胡十六国的佛像

由于北方民族的南下,西晋政权被驱逐出华北,迁都江南的建康(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317~420年)。与此同时,在华北地区北方系统的五个少数民族即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的数十个国家更替兴亡,这一战乱的时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317~439年)。五胡十六国诸朝的帝王,大部分是热心的佛教信仰者,竞相建造寺院、佛像。这一时期,西域的僧侣也陆续来到中国,其中西晋末年来到洛阳的佛图澄(232~348年),甚至得到后赵(319~352年)君主石虎的尊崇,对华北地区佛教传播有着巨大的贡献。佛图澄在世时门徒号称约有一万人,建立佛寺893所(《晋书》卷95《艺术传》、《高僧传》卷9《神异编》)。佛图澄之后,在华北地区前秦(351~394年)时期的道安(312~385年)、后秦(384~417年)时期的鸠摩罗什(344~413年左右)等高僧辈出,造寺、造佛及翻译佛经的活动十分兴盛,佛教信仰在华北地区的广大范围内扩大。